

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九年

# 《读书》十年

杨之水◎著

DU SHU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九年

# 《读书》十年

扬之水◎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读书》十年 / 扬之水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9.8

ISBN 978-7-5306-7339-3

I. ①读… II. ①扬… III. ①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17267号

《读书》十年

DUSHU SHINIAN

扬之水著

---

选题策划:李勃洋 刘勇 装帧设计:郭亚红

责任编辑:张雪 唐冠群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86-22-23332651(发行部)

+86-22-23332656(总编室)

+86-22-23332478(邮购部)

主页:<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字数:900千字

印张:49.5

版次:2019年8月第1版

印次: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198.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联系调换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1号

电话:(0539)2925659

邮编:27601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十年日记 百科全书

杨 早

《〈读书〉十年》是一本奇书。尽管看上去，它只是记录一位学者编辑生涯的日记选。

《〈读书〉十年》是扬之水一九八六至一九九六年间的日记选本，而本名赵丽雅的扬之水，正是当年“《读书》五朵金花”之一，稍明《读书》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界位置的人，都知道这套日记的重要性，它还原了“可信的”那个年代。

日记内容无非是记事与记感两类。而自古得能流传的日记，不只能见出作者生平、性情，还要能从中看出交游、艺文、时事、世情，堪称一部“全书”。风行一时流传不衰的如《越縠堂日记》《缘督庐日记》《湘绮楼日记》都有这种特点。反之，流水账式的《鲁迅日记》就不够自足，需要读者、研究者以大量史料与想象来脑补。

自然，日记作者名气愈大，地位愈高，而愈易流布。但好的

日记还要满足两条：一是作者并未自觉日记的传世可能，写作时不隐恶，不讳饰，不矫情。二是公布的版本也能少删、不增，尽量留其原貌。因此，日记之真伪与作者入世之深浅，有时恰成反比。史界重视的《忘山庐日记》《退想斋日记》，研究价值不输于名家手札。

再来就说到文笔。鲁迅在答太炎师问“文、学之辨”时尝言：“学以启人思，文以增人感。”将日记当小品写，原是古时常事。近代以还，私人日记功能性增加而审美性趋弱，往往只适合研究者爬梳史料，而无法讽诵咏读。世人亦不以美文视日记，然而日记的文学价值，无疑也是这份日记是否适于公共阅读、是否成为审美教育范本的一大标准。

全面、真实、文采，这些优点，《〈读书〉十年》俱全。作者有言：“当天的纪事，总还可以信赖（整理过程中，只有减法，绝无加法；极个别的字句之外，绝少改动），至少能够提供一点还原现场的线索。”这是真实。

说到全面，篇中片段，可作回忆录看，可作游记读，也可作精神生活史材料研究。如一九九〇年一月十一日的日记，便极见当时社会的精神生活状况：

“文学所的靳大成和许明拿来二百块钱，请《读书》出面邀请几个人，一起聊一聊，谈话题目是八十年代学术历程回顾。今天上午来了十四位，围绕论题讨论了一上午。午间我与吴方买来肯德基炸鸡，一人一份，算是午餐。饭后老沈来，大诉出版界苦经，于是上午大家所说的要走钻研学术一径，似乎也很难

了。”(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小小一段,三十年后再看,饶有趣味之处,非只一端。八十年代的终结与抱憾,九十年代的开启与彷徨,“出版界苦经”仍在诉着,“钻研学术一径”似乎越来越窄也还有人在走。而配上“肯德基炸鸡”,实事又像是某种隐喻,短短百余字,时代的风味浸润其间,至今不散。

时代是小炒,生活仍是主食,构成整部日记的烟火气息。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一日一则由听吴彬说香椿芽儿刚上市卖至八元一斤,这两天也得三四块钱(物价史材料!),忆起插队时吃香椿:

“更忆起插队时节在会青涧,春日里没一点儿油水菜蔬,只望着庄稼地里零星长着的几棵香椿树,每是我够下芽儿来,切成细段开水焯了,撒上盐,就是极香极香的好菜儿。有一回,几个人凑了一块钱,找着上头的老颠儿婶,换了十个鸡蛋,吃了一顿香椿炒鸡蛋,真是美死了。这也不过是几日里的事,过了这时节,更哪里寻一点点牙祭!”

这却是明末小品的风味。类似短章,日记中亦极多。

而《〈读书〉十年》更为读者称许之处,却在记“书”与“人”两层。作者彼时供职《读书》,又是痴迷阅读之辈,日记中购书借书读书谈书的记录,几乎到了无日无之的地步。有人说,将日记中提到的书名辑录出来,就是一部《八十年代京城精神生活提要》。

而“人”就更为丰富繁杂了。编辑、作者、朋友、师长、读者、

亲人,北京的、外地的、国外的,一个个都在寻常日脚中凸显出来。其中尤以金克木、徐梵澄、钱锺书等时时请益的前辈,沈昌文、吴彬等日日相处的同事,面目最为生动。

作者曾于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日记中自言:“《读书》这个‘小气候’是极为难得的,必当珍爱它。也许若干年后,我会写下关于《读书》的回忆录,那时想想这些小曲折,一定更会觉得有意思。”其实,《〈读书〉十年》已是绝佳的回忆录,从中不仅可以窥见各路学者的侧面音容,更有各饭馆的菜色,有日日经手的书单,也有车票点心唱片的价格。从《〈读书〉十年》中,我们至少可以还原出一部可信的生活实录,一辑精准的人物剪影,一册雅致的美文短章。

难怪黄裳看过部分日记内容后曾致信作者称:“因叹尊藏日记皆逸人韵事,可辑为一册,可惊俗目,又知足下为编辑时,辛勤周至,无怪为作者所胜赞,如此编者今无之矣。”

此次《〈读书〉十年》新版,又增入了“友朋书札”一辑,收二十七位师友信札计一百五十八封。这些师友,多为《读书》及《书趣文丛》的作者。除编著往来、书稿讨论等事务性内容外,各位师友点拨学问,平章人物,以至感慨时局,自书身世,长书短简,均能见出各人面目性情。这些信札,与十年的日记对读,更能见出“编辑”与“作者”之间肝胆相照、放言无忌的难得氛围。

可以说,这套日记,包括那些映照对读的书札,将是多年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研究者的福音。我们有幸作为同代人先睹为快,也是一种难得的缘分。

这些年，由于社群固化与学派分裂日益加剧，“知识界共识”成为某种可望不可即的理想，因此上一个“共识年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书写成某种神话，追忆之作也纷纷浮现，但回忆是那樣的靠不住，而有资格回忆者又集中于当日的领风骚者，当年普通的精神生活与日常记忆反而隐没入黑暗中。《〈读书〉十年》则以无可质疑的忠实与复杂，全方位地复原了八十年代的知识生活。由于这套日记表面的琐碎与个人化，它出版后并未受到许多还沉浸于往日传奇的读者足够的重视。随着时间逝去的洗礼，回忆与传奇会渐渐褪色，真能留下的，怕还是这一部个人的真实记录。

二〇一九年六月

## 序一

沈昌文

上天安排,让我在二三十年前认识了一位身材短小、名副其实的小女子:扬之水。

我那时在三联书店工作,具体负责《读书》杂志的编务。《读书》是出版界名流陈翰伯、陈原和范用创办的。我进去后发现,编这杂志的都是大人物,而且都是刚挨过大整恢复名誉未久的著名人士。

首先是陈翰伯找来的冯亦代。冯先生那时已年过六十,过去是外文出版局的专家,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之一。他的专长是美国文学,是党外的著名外国文学专家。但是他更出名的是大量的社会活动。他在文化界号称“冯二哥”,以善于排难解纷著称。一九五七年,他耿直敢言,祸从口出,因而被戴上“右派”帽子。“文革”中,又被打成“美蒋特务”“二流堂黑干将”“死不悔改的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后多年劳役摧残。现

在他刚恢复名誉,复出任职,自然干劲十足。陈翰伯可谓识人。

另一个副主编倪子明,是范用多年的老战友,出版总署的一位老处长。他是老党员,在党内挨过整,说他是“胡风分子”,因为他认识胡风。这位老党员是位少说话多干事的老实人。连他这样的人,过去也要挨整,现在想来,依然觉得奇怪。他党龄很长,因此在编辑部地位较高。

另外就是史枚。他是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的“大右派”,按“编龄”说,他最长。他曾是老共产党员,据说胡绳当年都还是他介绍入党的。范用聘他担任执行主编,让我十分惊讶。因为范用当年是人民出版社反右办公室主任,史老就在他手里划上“右派”的。现在做此安排,可见改革开放那些年头思想解放的深度和范用他们的胆略。

因冯亦代的关系,又引进了著名的画家丁聪来做版面。丁老又是一位著名的“大右派”。他同冯亦代一样,为人“四海”,广交朋友。冯同他又都是老上海,都同我特别谈得来。

三联书店名义上是家有着几十年悠久进步历史的著名出版社,那时却落得个“房没一间、地没一垄”的悲惨境地。我们在北京好几个地方租些平房、地下室办公。编《读书》的都是经过“文革”复出工作的大牌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都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其忙无比。因此,编辑部内十分需要操作具体编务的助手。那时能找到的都是刚返城的知青,只能在他们中间找对书本和知识感兴趣的年轻人。好在我们这些行政上的所谓“领导”,普遍学历都是初中。当时的实际负责人董秀玉女士,是五

十年代的初中毕业生。我本人更加特别一点：正式学历是初中一年级。而最早我们聘用的一位同事，是从云南建设兵团回北京的初中一年级学生吴彬。还有一位当今的大学者，王焱，当年进《读书》工作以前是公交车上的售票员，也是初中一年级学生。那些老前辈觉得这么一些中学生当他们的助手，也还得心应手。因此，我们对这些知青，一点不歧视。

于是，一九八六年某天有位朋友欲介绍一位女士加入编辑部。她过去为《读书》投过稿，不算陌生。一看简历，颇不简单。这“不简单”，按今天理解，必定是在海外某某名校上过学，等等。几十年前，这位扬之水小姐的“不简单”却是：读过初中，插过队，做过售货员，开过卡车，等等。卡车司机居然对文字工作感兴趣，而且确实在《读书》发表过文章，令人惊讶。大家觉得合适，于是录用。

这样就同这位女士成为同事了。工作之余，也聊天，可大小姐却往往“讷于言”，让我探听不到多少底细。只记得，某日，我忽然请她背诵党纲，她居然交白卷。我于是觉得这位部下水平不高。我过去一直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编政治读物，所以我只会这样考核部下。

她年轻，肯走路，于是经常派她出去取稿，实际上是做“交通”。这方面她效率挺高。但更令人意外的是，她所交往的作家学者，对她反映奇佳，因而效果也十分特出。最早是金克木先生。我同金先生也熟，知道他老人家博学，所以访行以前必做充分准备。可是金老同扬之水更谈得来。某次去取稿一篇，金老交

来五篇，都请她代为处理，他对扬之水在文化上的信任，竟如此。此外谷林、张中行、徐梵澄，等等，都对她极有好评。张中行先生对扬之水有深刻的印象。一九九三年他写了一篇谈扬女士的专文，居然说：“我，不避自吹自擂之嫌，一生没有离开书，可是谈到勤和快，与她相比，就只能甘拜下风。”作者和编辑的交往到如此莫逆的程度，实为我毕生所仅见。

我到了多年以后才知道，她是把同作者的联络当作一种“师从众师”，所以十分得益。她说过：“我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到了《读书》，一直到一九九六年。这十年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读书》认识的作者都是顶尖人物。这对于我来说是‘师从众师’了。不限于某一老师，这样就不会有一种思维定式，视野就更开阔了。那种帮助是一种影响，等于是他们在他们中间熏陶出来。我和徐梵澄先生的交往，在这方面受益就特别多。他特喜欢陈散原的诗，我帮他借，借完以后我自个儿又抄了好多，全都是营养。”

一九九六年，扬之水与我同时离开三联书店。我是退休，她是转业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以后她著述迭出，恕我不一一列举。我不大能看懂她的论著，于是人们问起她，我往往回答说：她现在在开文化卡车。她在文化大道上驶行不休，畅通无已，委实高兴。

《读书》杂志在前辈的带领下，在吴彬、王焱、扬之水这么一些中学生的实际操作下，何以成功；保守如沈昌文之流，何以在老前辈的带领下、一大批初中生们的促进帮助下，慢慢地、不得

已地蹒跚前进；而扬之水这位卡车司机，怎么能在《读书》杂志打工若干年后，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如此熟练地驰骋在文化学术的大道上，这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八九十年代文化界的一些谜。要知道谜底，请一读扬之水女士的这本日记。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

## 序二

吴 彬

赵丽雅，曾用名赵永晖，笔名扬之水，是我多年前的老同事。我们的关系就如歌中唱的“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就算许久不见面，碰头时仍像昨天下班刚分手今天又见到一样，没有任何隔阂与生疏感。不论说什么话谈什么事，想法差距再大也尽可随意放言，从不担心对方会介意，真的听着不顺耳了，也就是自认晦气而已。我仗着比她大两岁，有时还要说几句带点儿教训意味的话，她全然无所谓，我也一样不在意。

这就是我们的“老同事”之谊，这样互相绝对信任、不亲密但无间的关系，我们把它叫作“同事”，没有定位为“朋友”。我想这是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的“同事之谊”更可宝贵。我们是在《读书》杂志做“同事”的，那是我们全力以赴求知、充满激情工作的岁月，是我们的青年时代。

赵丽雅好不容易地下了决心要出版这部十年的日记，请我

帮她编辑和写篇序，而且还指定序言不许写她个人而要写《读书》；我也好不容易地才下了决心让自己暂时回到早已走过的时空中去，找找当年的脚印，想想留在自己感觉和记忆中的《读书》——只是我的，不是赵丽雅的，也不是其他人的，当然更是挂一漏万的——《读书》。

我是在《读书》创刊之前，由于一个很偶然的的机会来到这个正在筹备的刊物的。那时我是个刚刚从边疆回到北京的知识青年，也叫作“待业青年”，来编辑部只是义务帮忙打打杂。连初中都没有正经读过的我，对这里充满了景仰和好奇。

《读书》是一九七九年四月创刊的，创办者是几位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即在知识界、出版界工作，文化素养深厚且具有强烈责任感的老前辈：陈翰伯、陈原、范用、倪子明、史枚、冯亦代、丁聪等，这些先生组成了当时的编委会。策划这本期刊时，他们得到了刚刚开始复苏的中国知识界老一代中坚人物的大力支持。听范用先生说，当时杂志名称初拟为《读书生活》。征求意见时，夏衍先生说，“读书”就好，何必“生活”，刊名遂由此而定为《读书》。我有时想，也许加上“生活”二字，杂志会是另一种面貌也未可知。

杂志的创刊意图是：针对此前三十年对读书所设的种种禁区而倡导阅读的自由。刊物的方针是“以书为中心的文化思想评论刊物”，提倡读书、思考、探讨，对当时思想界的种种混乱想法和现象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读书》的方针在一九八一年第

一期的《两周年告读者》中明确形成,基本为:解放思想、平等待人、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不做无结论的争论、提倡知识、注意文风,等等。这些办刊原则当时被编辑部奉为圭臬,《两周年告读者》的作者正是创办人陈翰伯先生。

创刊前的几个月里,编辑部始终洋溢着一种紧张而热烈的气氛,执行副主编史枚先生和董秀玉女士是具体的操作人员。我跟在董秀玉后面听候指示。董秀玉当时很年轻,大家都叫她“小董”(后来她从香港回来当三联书店总经理时,我好不容易才习惯了叫她“老董”)。那时,前辈们虽至少是花甲之年的人,但心气热情之高却如年轻人,他们天天乘公交车来朝内大街一六六号上班,开会时不是大说大笑、高谈阔论就是激烈争论。前三期的草目出来时,一位前辈看到在一边伸着脖子的我,就递过来一份说,你看看怎么样。我记得当时的目录中开宗明义就是《读书无禁区》,接下来有《图书馆必须四门大开》《海关关书——三尺法何在?》,等等,当然说:太好了。不料前辈说,这话太泛了,怎么个好法?我回答,这是大家都想说又没有地方说的话。他这才点点头:这还差不多。

为了让杂志杜绝错字,编辑部拿出严防死守的绝活,除了专职校对的前两校外,由我和董秀玉在三校时担任“读校”,就是我们俩轮流一个读原稿一个看校样来校对全刊的约十六万字。读稿时要把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读出来,什么“点”“圈”“书名”“冒”“上引下引”之类。读完一期杂志要整整三天,真是读得头昏脑涨、口干舌燥。前三期杂志就是我们两个这么读出来的。

董秀玉曾是业务最好的优秀校对员，我对校对业务的知识，包括各种校对符号的标示方法等，基本都是在这个时候跟她学的，也算是出自名师门下。

看到有古朴端庄绿色封面的第一期《读书》，是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的音乐会上，“小董”从印刷厂直接来到剧场，带着新的第一期杂志，当时编辑部的先生们都在这里，那种开心真是无以言表。不过，在那以后我暂时离开了编辑部几个月，走时却没有想到还能回来。

因为杂志是属于出版社的，我作为“待业知青”不能进入这样的国营机构，出版社也没有可以招收人员的“指标”。我需要起码先使自己具有“全民所有制”机构人员的身分，才有可能“自带指标”进入出版社，那真是谈何容易！但天无绝人之路，参加了当时面向知识青年的招工考试后，我进了一家“全民所有制工厂”去当油漆工。不想几个月后，董秀玉就去工厂为我办了调动手续。如同做梦一样，我又回到了《读书》编辑部，从此一待就是三十年。

我回到的编辑部已经热闹多了，编辑人员开始增加，沈昌文先生作为执行主编执掌了全部编辑工作，王焱、贾宝兰、杨进、倪乐、赵丽雅等也陆续来到《读书》。

在各位经验和学识深厚的前辈引领下，我们既兴奋又兢兢业业地学习办刊的工作。杂志是自创刊始就围绕着中国文化界、知识界、思想界所关注的种种问题组织编辑工作的，我觉得